

「香港文學特藏」在本論文的撰寫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以香港詩人溫健騮作為研究對象，整理與分析溫健騮的翻譯、創作與論述，以回應學界近年有關文化冷戰與全球六十年代的討論，在冷戰文化與思想史的歷史語境中重新審視 1960、70 年代香港現代詩的發展。溫健騮是 1960、70 年代香港重要的現代詩人，在香港與台灣詩壇享負詩名，但在他 1976 年因鼻咽癌猝逝後，對他創作、論述的整理與研究至今仍處於起步階段，其作品結集僅有《溫健騮卷》（1987）、《苦綠集》（1989）與《帝鄉》（2020），均在坊間罕見。「香港文學特藏」的相關收藏，是本研究得以開展的基礎。

本文關注 1960、70 年代的溫健騮如何以詩學回應冷戰時代現實，又如何吸收、轉化、回應全球六十年代的激進思潮，有關分析必需建基於溫健騮的詩歌、政治評論。溫健騮曾在《中國學生周報》、《盤古》與《文學與美術》等等文藝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翻譯與評論，其中不少文字並未收入作品集。「香港文學資料庫」與「香港文學檔案」中豐富的報刊材料為本文搜集相關資料提供了莫大的便利。而且，溫健騮 1970 年代的評論、詩作往往緣事而發，與時事或香港文壇動態有緊密關係。資料庫完備的目錄索引與電子化搜尋功能有助本文快速檢索相關文章，在歷史語境中對溫健騮的創作與論述作出分析。例子有如溫健騮發表於 1971 年 4 月 2 日《周報》的〈關於「新詩的出路」〉，是對較早前古蒼梧於 1971 年 3 月 26 日發表的〈新詩的出路〉的回應；同年 8 月 20 日溫健騮寄給《周報》的信函，亦再次回應以上兩文。通過「香港文學資料庫」，本文得以更全面地追蹤溫健騮的思想發展。

最後，文學特藏所保存的作家書信文件，為本文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文獻材料。特藏保有溫健騮與戴天的書信文件，而戴天則是向愛荷華寫作計劃介紹溫健騮的引薦人，二人有緊密的聯繫。溫健騮在與戴天的通信中曾交待他在愛荷華留學的經歷，有關材料令本文得以更清楚把握溫健騮在愛荷華期間的政治與文學活動，為本文的論述提供了重要的依據。